

王锦贵 主编

中国文化史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简编

王锦贵 主编

吕 艺 张 积 罗 纬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简编/王锦贵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3

ISBN 7-301-06643-0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978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史简编

著作责任者: 王锦贵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43-0/G·09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10.125 印张 295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绪 论

- 第一节 文化概念..... (1)
-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形成及重要特点..... (6)
- 第三节 学习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17)

第一章 文字与图书

-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31)
- 第二节 古代书籍的发展 (43)

第二章 科学技术(上)

- 第一节 天学 (63)
- 第二节 地学 (66)
- 第三节 农学 (72)
- 第四节 医学 (76)

第三章 科学技术(下)

- 第一节 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 (90)
- 第二节 动力技术与信息技术 (96)
- 第三节 传统科技基本特点 (102)

第四章 文学艺术

- 第一节 传统文学样式的诞生与发展..... (114)
- 第二节 传统艺术的诞生与发展..... (127)
- 第三节 文艺的民族特色..... (134)

第五章 史学

- 第一节 悠久史学..... (151)

第二节	史学著作·····	(157)
第三节	史学传统·····	(164)
第六章	典章制度	
第一节	官制·····	(175)
第二节	教育制度·····	(188)
第三节	法律制度·····	(195)
第七章	社会习俗	
第一节	家族·····	(209)
第二节	婚丧礼俗·····	(214)
第三节	岁时节日·····	(221)
第八章	宗教	
第一节	中国古代流行的主要宗教·····	(231)
第二节	道教的流变与发展·····	(239)
第三节	佛教的兴盛与中国化·····	(247)
第九章	哲学	
第一节	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	(260)
第二节	古代哲学思想的演变·····	(268)
第三节	古代哲学思想的终结·····	(279)
第四节	古代哲学思想的特点·····	(287)
第十章	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开辟丝绸之路·····	(291)
第二节	拓展交流规模·····	(299)
第三节	迎接新高潮·····	(305)
第四节	文化交流的特点·····	(311)

绪 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毫无疑问,用儒家经典中的这两句名言来揭示和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精神,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因为正是像天体运行不已、“自强不息”那样,形成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正是像大地胸怀宽广、“厚德载物”那样,铸就了炎黄子孙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宏大气度。人类历史上原本出现过最古老的四大文明,而发展到后来,只有中华文明是个例外,惟有她始终没有出现文化断层。反思其中背景,或许与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的主导精神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应当继承发扬的精神食粮,她也是全人类应当认真总结的宝贵财富。

第一节 文化概念

要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首先应该明白和了解有关文化的基本概念,因为这是研究的基础。

一、古今“文化”

“文化”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粗略统计,近代以来有关文化的定义居然多达一百余种。

中华民族对“文化”一词并不陌生。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中就已经出现了“以文教化”之说。《周易·贲卦》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或许是“文化”的最原始的出处。汉代以降,“文化”一词更是频频出现。不过,中国古代的所谓“文化”,一般都限制在同武力征服相对应的“文治教化”的义项内。诸如“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束皙《补亡诗·由仪》,引萧统《昭明文选》卷十九)云云,率皆如此。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显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从字源上看,现代所谓“文化”,当初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早期出现于英文与法文中的 *Cultur*、德文中的 *Kultur* 以及俄文中的 *Культура*,无一例外都是译自拉丁文中的“*Culture*”。“*Culture*”词义较多,在拉丁文中有耕种、居住、练习、敬神诸义项,而在法文中还引申有性情陶冶和道德培养之意。由此可见,西方“文化”的内涵要比中国古代的“文化”丰富得多。

早在 1871 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就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一观点发表后,曾在文化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是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C. 克鲁克洪《文化的概念》,见《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3~1974)则主张从两方面界定文化的内涵。一是“一般性”概念,一是“多元的相对的”概念。前者认为文化是“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后则认为,“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含该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

国内众多学者也有自己的观点。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

不包”(《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局,1949)。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文化与生活》,见《中华文化之特质》,世界书局,1969)庞朴先生则把文化区别为三个层面:“物质的一制度的一心理的”。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光明日报》1986年1月17日)

综上所述,现代所谓文化虽因研究的视角不同而众说纷纭,而从一定意义上,则可以归结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种观点。所谓广义文化,即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成就的总和。它包括人类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自国家社会制度,小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观念,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各式生活用品等等,无不为广义文化所涵盖。所谓狭义文化,特指意识形态,即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诸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各式各样的制度和组织等等,皆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目前,持这一观点或接近于这一观点的国内学者,所在多有。如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认为,“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最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成果”。(张岱年、姜广辉《中国传统文化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又如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认为,“尽管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歧见纷纭,但加以提炼,大致可归纳为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二说”:前者“指人类劳动创造成果的总和,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广义的文化”;后者“则指与特定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二、地域文化

地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历史悠久而又疆域辽阔的中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依托,倘若没有一个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所谓中国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区域文化众多,其中较有影响者就有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关东文化、吴越文化、草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青藏文化等地区文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一个地域文化都是中国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中心。当然,在由远而近的中国社会里,由于各种因素所致,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呈现出由北而南的发展走向。大体上说,北宋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化重心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经由当时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西安、洛阳、开封向四方辐射,出现了彪炳千秋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自南宋始,中国古代文化重心逐渐转移于南方的长江流域。经由当时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杭州、南京向周边辐射,又出现了闻名遐迩的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赣州文化、江浙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文明随之东来。在与西方文化的多次碰撞、交流中,中国的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各地又赫然崛起了一系列生机勃勃的区域文化:沪上海派文化、岭南文化、港澳文化、台湾文化。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上各个地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曾经光芒四射,人才辈出,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浓墨重彩地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地域文化还塑造出了极具特色的当地人物的群体形象。地域群体形象是如此鲜明而厚重,以至于只要你说出籍贯,人们马上就会将你与当地文化联系起来。例如早已定格于中国人脑海中的中原人的厚重,关东人的豪爽,湖湘人的勇敢,江浙人的重商理念等等,这固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却又是不同地区文化历史的积淀使然。

三、传统文化

中国人都很熟悉“传统文化”这一词汇。的确,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学术交流中,我们几乎随时都可以碰到“传统文化”。然而,究

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社会上却流行着种种不同的观点。或者认为,所谓传统文化,就是特指在我国上起先秦,下止清代中叶的古代社会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化。或者认为,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也应该包括近代以来,乃至“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既有稳定状态,又有动态变化,能够包容不同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的文化。(张智彦《传统文化研究述评》,《哲学研究》1986年,6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对“传统文化”的界定或许更深刻些。他在较早的时候就曾指出,除了广义、狭义两个层次的文化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层次,姑名之为深义的文化。这就是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的确如此,在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之外,确实还存在着一种被周一良先生称之为“深义文化”的文化。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或许也可以称作“主导文化”或“核心文化”的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从中国悠久文化积淀中抽象出来,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她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的一种文化。应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富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在自身长期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它虽然肇始于过去,却贯通于现在,还必然要影响于未来。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民族在一般意义上代代相传的历史遗产,而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宝贵财富。对于本民族而言,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无时不有,又几乎无处不在。由于它的存在和影响,人们在诸如心理结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等各方面,都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形成及重要特点

世界上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诸因素都有重大关系。

一、基本成因

(一) 自然环境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要素。

自然环境不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惟一因素,然而在诸多因素中,它的影响之大却是无可否认的,而且时代愈久远,作用就愈明显。特别是人类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当时的人们在强大自然界面前几乎是无能为力。因而,古代文化就最容易成长在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周围具有天然屏障可资保卫的自然环境之中。

仅从自然条件上看,以下三个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影响。

首先是适宜的温带气候。对于古代文化的产生而言,适宜的气候条件至关重要。梁启超先生曾分析道,“人类所以进化者,不徒恃物质上之势力而已,而并恃精神上之势力。故物类之争生存也,惟在热度之强盛、营养之足用而已。人则不然,恒视其智识道德,以为优劣胜败之差。人物所循天演之轨道,各自不同,盖以此也。夫酷热之时,使人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欲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它。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梁氏的“温带气候决定论”固然有偏颇之嫌,但是无可否认:适宜的气候确实对文化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我国的气候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以文明发达较早的中原一带为例,因为地处北纬 35 度左右的北温带,广大领土在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故所得阳光照射较热带为少,较寒带为多。从总体上看,中国既不像热带

那样炎热,又不像寒带那样酷寒。西高东低、呈阶梯状伸入大海的地势,为海洋湿润空气深入内地提供便利的条件。素有古代文明摇篮之称的黄河流域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既有春、秋二季的温暖,又有冬、夏两季的酷烈。如果说前者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那么后者则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天然力相争”的拼搏精神。

其次是波澜壮阔的大河。在过去,尤其在古代,河流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黄河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发祥地,流域面积达 75.24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伟大的母亲河。经考古发现,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当丰富。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只有东非的“奥杜威文化”能够与它相提并论;经碳 14 测定,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是距今八千年左右的中原文化。由于黄河不仅有数千公里主流的浩浩荡荡,而且支流众多,纵横交错,犹如神州大地上的根根血脉,所以先秦文化往往滋生在各条支流、支流沿岸以及支流与黄河形成的三角区域。例如夏文化发生在河南西部之伊水、洛水沿岸及流入黄河之三角区;殷文化发生在河南安阳之漳水、洹水沿岸及流入黄河之三角区;周文化发生在陕西东部之渭水两岸及流入黄河之三角区。周秦以后,长江流域日渐发达,与黄河流域一起创造着中国古代文化。

其三是封闭式的大陆。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大陆民族。所居之处,三面环陆,一面临海,古代的中外交通极其困难。中国不仅因为大海之隔,难以同西方世界交往,也因为崇山峻岭和茫茫沙海所阻而很难联系身旁的陆地邻邦。试看东部固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她所面临的是绝非地中海、黑海或里海那样的内海可以比拟的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太平洋茫无涯际,在遥远的古代,无疑是设在中国东部的一道极难逾越的天然障碍。由于是典型的大陆民族,四周环境几乎同外界隔绝,而内部却有较大回旋余地,所以中华民族在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譬如视觉所及者,从纯系保卫而非进攻性质的万里长城,到城中之城的故宫,乃至自成一统、随处可见的中国北方四合院,无一不是这一特征的形象注释。

(二) 社会环境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的社会环境:

其一,农业自然经济。世界上大约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能把农业文明发展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进入阶级社会后,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以领先世界的超一流水平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是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两大类型,但是,在中国古代经济中最具特点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则始终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不但在奴隶制时代是社会经济主干,进入封建社会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农业经济不仅决定了古代统治者“崇本抑末”的价值观,也决定了广大劳动者的思想意识。农民既然是以“农”为业,也就意味着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他们不仅本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葬于斯,终生厮守着祖上所留基业,而且还要后世子孙像自己继承先人遗产那样世代相续。这就不能不使古代传统的农业结构变成一个层层封闭的体系:家族与家族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间隔。农民们固然由此养成了勤劳、朴实的性格,但是,在滋生故土难离、“敬天法祖”、热爱田园的思想意识的同时,也孕育出诸如喜稳定、不喜变革的文化心理。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还促成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平均思想在封建社会土地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朴素意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其二,家族宗法制度。宗法制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虽然从明代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滋生发展,商品经济对包括宗法制在内的封建制度有一定的瓦解作用,但中国广大地区依然是沿袭祖祖辈辈的传统生活方式,始终保持古朴、简单的田园特色。由

于历史悠久,发展充分,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的思想影响一代代地积淀下来,宗法制度下的某些心理至今仍然时有体现。例如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素以国家、民族、乡里、家庭为重,强调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西方民族则以个人为重,四海为家。宗法观念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保守、崇古、尊重传统的思想习惯。保守、崇古固不可取,“尊重传统”也要分析,因为“传统”中未必都是精华。

其三,政治大一统。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与古代西方的武力征服下的“一统”局面大不相同。武力征服往往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一旦国势不振,必然导致分裂、灭亡而不可收拾,古罗马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则是民族向心力的凝结,社会基础相当深厚。政治上的大一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政治生活。随着历史的前进,那种人心思定、人心思统,反对分裂、坚持统一的文化心理往往日益强烈,并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上的大一统对学术思想领域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汉武帝时期,政治一统不仅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总方针的确立,也促使了综合性学术著作的问世。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与司马迁《史记》的同时问世,既有思想学术发展的必然性,也有政治环境和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

当然,政治上的大一统有促进文化发展的一面,也有不尽如此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古代的政治大一统往往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大一统”。封建的专制主义的文化“大一统”,往往注重文化领域的共性,忽视、限制乃至故意抹杀进步文化的个性,因而直接破坏了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宽松环境。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封建社会后期愈演愈烈的禁书运动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显然都是有害于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的。

(三) 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共发生过三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输入。这三次外来文化的输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是西域文化的输入。我国同西域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特别是在“丝绸之路”开辟后的汉唐两朝,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都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西域各国使节、商贾的东来,不仅传入了许多名特产品(如波斯的首蓿、葡萄,大宛的石榴、胡麻,奄蔡的貂皮,大月氏的毛织品等),丰富的精神文化也随之而来。例如汉代著名音乐大师李延年就曾“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崔豹《古今注》);中亚的胡腾舞、胡旋舞在长安广为流行;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袄教、摩尼教、景教在隋唐时由伊朗传入,当今世界三大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也是那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

第二次是南亚次大陆文化的输入。作为南亚次大陆文化主体的印度佛教文化,早在西汉末年就开始传入中国,至唐代已趋兴盛。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它不仅为中国输入了一个全新的宗教,还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注入了活力。例如在学术思想领域,印度佛教哲学比起魏晋玄学来更富于思辨,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也正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了佛、道两家思想的产物。

第三次是西洋文化的输入。从总体上说,西洋文化的输入发生于近代。但若干领域的零星输入则至少可上溯到16世纪。从明代中叶直至清代中叶,西洋文化的东传始终没有停止过,但规模不大,影响甚微。直至1840年西方炮舰打开清廷闭关锁国的大门后,这一局面发生巨变。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为标志,西洋文化的输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不单在时间上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空间上也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地域范围。对她产生根本影响的基地固然是中国这块土地,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其他空间的重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二、重要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我们认为,除了学界普遍认同的诸如“天人合一”、“和为贵”之类的特点

外,以下五点颇具特色。

(一) 崇尚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

崇尚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素以人文为本位,所以伦理道德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提倡。长期以来,它被看做是调和人际关系的准绳和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伦理道德在中国威力之强大,影响之深远,是其他民族不能比拟的。如果说长期以来欧洲曾经是神学统治的天下,中国则是伦理道德主宰的世界。

中国的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素有“五伦”之说。五伦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谓也。其实,这是五种人际关系。五伦中,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都属于家族关系范畴,君臣关系、朋友关系可以看做是以上三种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君臣犹父子,朋友犹兄弟。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调和剂,伦理道德渗透于整个中国社会。它使人际关系中的对立因素趋于统一,经常处于一种调适、和谐的氛围之中。具体来说,一方面是臣对君要忠,子对父要孝,妇对夫要顺,弟对兄要恭;而另一方面则要求君对臣要仁,父对子要慈,夫对妇要敬,兄对弟要爱,朋友之间要重信义,“友其德”。伦理道德成了所有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准则,于是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49)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伦理的思想意识与西方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并不强调忠孝思想,没有严格的长幼尊卑的此疆彼界,注重所谓人人自由平等,惟求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特别肯定个人价值,而是在把人置于伦理框架的前提下,特别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换言之,亦即特别重视个人必须对他人、对社会做贡献,尽义务。客观地说,这种思想意识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因素。其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社

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消极因素则是明显忽略了人的自身价值和应有的权力。

(二) 重视政务的价值取向。

重视政务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政治型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的推行和宣扬有直接关系。先秦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的儒家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说到底,也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秦代以后就不同了,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由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了既定国策。在学术领域中,儒家思想由此确立起“一尊”的地位,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与道家的“出世”观念不同,儒家重社会、重人生、重现实,一切以着眼于当前、解决社会问题为基点。惟其如此,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既存在着以求“善”为宗旨的“伦理型”文化的一面,同时还存在着以求“治”为宗旨的“政治型”文化的一面。也正因为这样,崇尚政务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并且表现得普遍而又典型。

政治型文化主要是通过两项重要的举措实施的。其一,通过古代教育制度,鼓吹“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使儒家求“治”思想深入人心。广为流行的《神童诗》,核心思想就是歌颂读书做官论。不论是其中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公开宣传,还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劝学”诗,无一不是向读书人强调“学而优则仕”的光明前途。其二,通过各种选举制度,使“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组织上得到落实。在汉代察举、征辟和曹魏以后的“九品中正制”等各种选举制度中,文化知识的含量还不特别明显,而在隋唐到明清的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中,文化知识已经成了取士入仕的根本尺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治国安邦的奇才都是通过这条道路步入政坛的。

毋庸置疑,由于政治型文化氛围的营造,使得人们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民生的风气成为代代相传的自然而然的传统。中国古代不仅由此涌现出了像王安石、文天祥、林则徐、谭嗣同那样的一大批治世栋梁,而且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政治格言。无论是前人崇